

孫中山先生與台灣（續完）

王成聖

國父五次來台考

多賀宗之親口敘述

據滬軍都督府時代，陳英士的參謀長黃膺白（鄂）夫人沈亦雲著「亦雲回憶」第八章：「不幸的二次革命」，頁八十七有謂：

「七月卅日，袁政府懸賞通緝克強、英士、膺白及李曉垣四人，此係第一張癸丑通緝令，有賞格，註明：『不論生死，一體給賞』，揭示通緝，遍登各報。我與膺白均親見之，遂撥往七浦路我親戚家。親戚姓周，與沈縵雲先生亦為至戚。先一日送縵雲先生登舟赴大連，次日送膺白與我登舟赴長崎，均在夜間，由主人自開車，時在癸丑八月初旬。惟英士先生赴甬後，復歸滬，由滬東渡。其東渡之日在膺白後，離滬之日則在膺白前。某某數君後作英士先生行狀墓誌等類，輕心下筆，實未參與實際。膺白守一死一生之義，概未置辯。今膺白逝世亦久矣，故述當時情形如上。膺白東渡，張岳軍先生同行。船名八幡丸，有中山先生鐵路公署秘書宋君和眷屬同船，頭等

艙已客滿，我們在二等艙。癸丑八月以後，革命失敗同志先後到日本，日本人稱為『亡命客』。

沈文較為詳細，所記七月卅日袁政府懸賞通

緝黃興、陳其美、黃鄂、李書華四人，暨八月以後，革命失敗同志先後到日本，尤為中山先生八月初啓程入粵轉台赴日之明證。至於袁政府懸賞通緝，原件尚存。公私書報製版刊登，多稱袁世凱所出之賞格，或稱袁政府之通緝令。其實原件之上另有英文譯文。中文未署名，英文署名則為 [Signed] and Sealed by the Civil Protector of Shanghai: Tseng ju Cheng (Admiral)，那正是袁世凱心腹愛將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海軍上將或艦隊司令）。這一份「賞格」金額相當的高，黃興十萬元、陳其美五萬元、黃鄂、李書華各兩萬元。公佈日期為民國二年七月三十一日，鈐有：「上海鎮守使印」小官章一顆。

根據近年陸續發現的新史料，包括日籍相關人士，台灣革命同志，曾經為中山先生執役的廚師、女侍等等所作的回憶：民國二年癸丑二次革

命失敗後，中山先生一連兩次蒞臨台灣，其詳細經過，大致如次：

日人井佐上太郎曾於民國三十五年三月發表一項珍聞祕錄，摘記多賀宗之口述當年孫先生來台經過。多賀係於民國二年八月三日下午三時，由福州乘汽艇趕赴馬尾，登上德輪約克號，晉謁中山先生，報告粵中情勢有變，粵軍叛亂，龍濟光率部東下，將近廣州，陳炯明已遁往香港。中山先生當時曾向多賀道謝，但是他告訴多賀說：「本人昨天離開上海前，還曾接到黃興先生自廣州來電（筆者註：接黃興電，當係多賀記憶之誤。因是時黃氏已東渡，在粵主事者，應為陳炯明。）據告粵中各事進展尚稱順利。因此，我想我還是按照預定計劃到廣州去。」

但是多賀宗之深以中山先生的安全為慮，他再三陳詞，力稱他所接獲的情報絕對正確，希望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珍重，萬勿冒險。中山先生頗為多賀的誠意所感動，不過由於討袁之二次革命，成功失敗在此一行，仍然抱着雖千萬人吾往

矣的大無畏精神，堅不改變行程，仍擬附輸入粵岸，當不難獲悉粵中情況。」

「我想我還是乘坐原船先到香港，在香港登岸，當不難獲悉粵中情況。」

多賀宗之懇摯的說：「如果做人所獲的情報屬實：粵中有變，那麼香港必將拒絕閣下登岸。尤以港府扣留岑春煊氏一事而言，誠恐粵中主事者與港府有所默契，可能會對閣下不利。萬懇閣下切勿輕履險地。」

郡寬船長如臨大敵

多賀宗之告訴中山先生說：「日輪撫順丸明日將自馬尾駛台，船長郡寬四郎君是做人好友。做人可以馬上去撫順丸船上，請郡寬船長護送閣下到台灣。」

中山先生遲疑了一下，仍然堅持原議，他回答多賀宗之說：

中山先生

沉思俄頃，信手翻開桌上攤開的一本地圖，然後做了個初步決定說：

「不得已時，我惟有再赴日本，俾可與旅日同志開會商議，再決定爾後動向。」

多賀宗之畢生崇拜中山先生，在這個緊要關頭，實在是顯得熱心之至，他坦率的說：

「做國當局對於中國時局，雖然採取不干涉原則。但先生赴日後能否獲得便利，做人不敢言其必。閣下仍以先赴台灣為宜，做人可以立即致電台灣日據當局，多方予以協助。」

中山先生當時一心急於趕到廣州，盡起討袁大軍，所以他依舊婉詞相拒的說：「本人承多方關注，實為感謝。不過，本人仍將另行設法。」

多賀則仍鏗而不舍，力促中山先生勿蹈險地，及時改變行程，他憂形於色的說：

「如今局勢急迫，已無再行考慮之時間。做人來此乘有汽艇，泊在約克號畔，請閣下立刻換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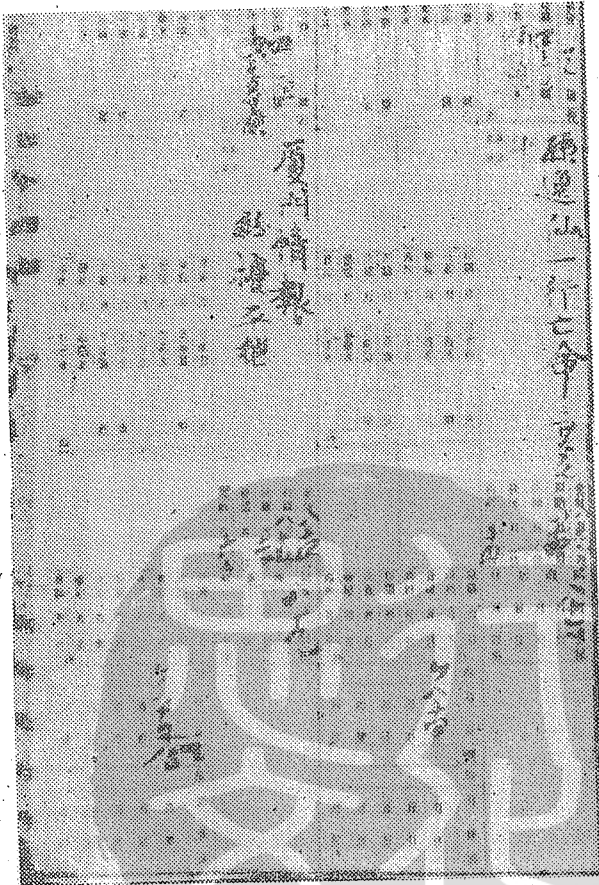
中山先生不願輕易改變行程，多賀宗之情詞懇切，盛意拳拳又不便峻拒。因此他說：「那麼，就等到今晚九時再作決定吧。」

多賀宗之無奈，只好向中山先生告辭，約定當晚九時再來謁見，聽取中山先生的最後決定。

多賀離船後，中山先生便命人利用約克號上的通訊設備，探詢廣州方面情況，果然在晚間證實了多賀宗之所提供的情報完全正確。於是中山先生方始決定採納多賀的建議，轉赴台北。九點整，多賀宗之如時抵達——此人辦事慎密，相當注重效率，他辭離中山先生後，便乘小艇到撫順丸船上，安排好了護送中山先生赴台灣的一切事宜。

因此，當他九時再到約克號上聽回音時，撫順丸船長郡寬四郎也帶着一支手鎗，還有幾位孔武有力的水手，前來担任中山先生的臨時護衛。

多賀宗之、郡寬四郎等人登上了約克號，目



民國二年 孫中山先生第二次來台係在八月初之鐵證，日本駐福州領事館通知日據台灣總督府之公文摘由單，上列日期為八月三日發出。

親約克號上忙於載貨，大批苦力熙來攘往，船上雜亂異常。中山先生迅即接見多賀、郡寬二氏。開門見山的告訴他們說，已經決定先赴台灣一行了。多賀、郡寬聞言如釋重負。那時候中山先生和隨行人員中之胡漢民已經收拾好了行李，李期如、梅光培二氏則奉中山先生之命乘坐原船仍赴香港。多賀與郡寬唯恐袁世凱及其屬下派人雜在苦力之中行刺，很緊張的握槍實彈，嚴密保護中山先生和胡漢民，從官艙步上甲板，直到登上多賀的小艇為止。

中山先生和胡漢民平安登上日輪撫順丸後，撫順丸船長郡寬四郎非常高興，曾經開酒勸飲，為中山先生賀。同時下令全體船員值夜守衛，嚴加戒備，以防不測。多賀宗之當即在撫順丸上住宿一宵，翌日仍乘小艇返福州。他一到福州便



孫中山先生二次來台時，得謁見之革命志士翁俊明。

拍了個密電給日本駐台海軍司令部參謀長木下宇三郎，請他就近照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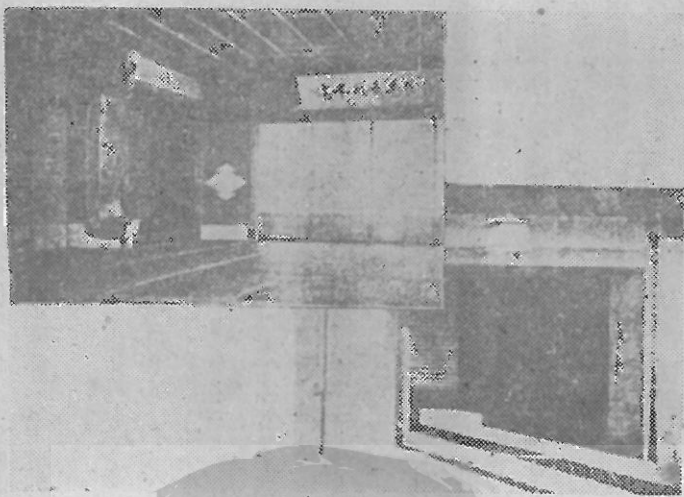
中山先生乘撫順丸安然抵達台灣，逕赴台北，由久住台灣的同盟會老同志楊心如負責接待，下榻於大稻埕李春生氏所擁有的一所大樓，址在建昌後街。也就是現在與西寧北路相毗連的南京西路二九三巷土治廟裏的一環之地。楊心如如中山先生的小同鄉，廣東香山翠亨村人，早年來台担任台北美最時洋行帳房。美最時洋行的買辦是吳文秀氏，自乃父起經營茶葉，頗雄於貲，對中山先生崇拜已久。中山抵台後吳文秀即挽楊心如為介，晉謁中山先生，吳氏即為中山先生旅台時期的居停主。其後又被台北革命世家高蘭，迎往他在石橋仔頭的家中住過一段時期，地址即今之延平北路二段，高蘭之好友陳秋蘭曾為割台時期台灣北部抗日義軍領袖之一。還有敘述這一段史實的陳義芬的父親陳聯陞，俱獲中山先生接見四次。又據劉金渭氏記憶所及，中山先生當年曾由同志三人陪同，在頂北投櫻川閣旅社小休一週，其後返抵台北，又數日即行離台。也有人說在那一次中山先生蒞台行程中，中山先生曾經到過日月潭、赤嵌樓、吳鳳廟等名勝地區一遊。此一節曾載諸於張其昀博士著之「黨史概要」。據說，當時因日據當局監視嚴密，台胞知道中山先生蒞台者，少之又少。又據前台北縣議員周碧說，中山先生二次蒞台時期，還曾在基隆船塢頭大阪商事會社支店長的家裏住過些時。

村上玉田目擊離去

二次蒞台接觸最多的是老同志、小同鄉楊心如。楊心如係與中會時期的老同志，為當年所謂四大寇之一楊鶴嶺之堂弟，曾經參加過乙未（一八九六）廣州起義。失敗後亡命來台，被美最時洋行買辦吳文秀延攬為帳房。翌年陳少白自日本赴台灣謀設與中會，到台後人生地疏，舉目無親。正是風聞楊心如在台輾轉找到了他，方由吳文秀負責招待，幾經奔走，慘淡經營，始有廣東股商趙滿潮、容祺年等人加盟，奠定了台灣革命組織基礎，而建立了另一處有力的根據地。據楊心如往後語人，中山二次蒞台時期，曾經向他痛陳袁世凱之諸多罪狀，對於當年國民黨同志之空涉理想，精神煥散亦頗表不滿。可是中山先生本人則仍信心堅定，鬥志昂揚。他曾談起他的討袁計劃與今後任務，使楊心如亦為之振奮鼓舞。楊心如後為國民黨在台灣之中堅份子，且為日據時代無居留權之我國同胞抗日組織：「華僑協會」的主要領導人物之一。他在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後的民國三十五年十月間逝世。自乙未廣州之役以至台灣重歸祖國懷抱，楊心如是一位福壽全歸，及身得見革命成功的老黨員。

孫先生這一次蒞台，前後住了一個多月。其後即離台赴日。日據時代台南消防組長村上玉田，當時正為新聞記者。他曾親眼目觀中山先生從基隆社寮島登輪赴日本，並與中山先生、胡漢民、戴傳賢同船抵達神戶。據村上玉田的自述說：「本人原為新聞記者，當孫中山先生離台赴

日時，余亦適逢其會，自基隆乘船出港，登輪返日。當時在小船上遙見基隆社寮島（今之社子）方面有小船駛來，載客三人，並有水上警察多人隨護，登船後逕入頭等艙房。余初不知為何許人，後始詢知係孫中山、胡漢民、戴傳賢三先生。自基隆赴神戶途中，胡戴二先生尚不時在食堂出



孫中山先生二年三次來台時，曾作小憩的「梅屋敷」酒店，原名台北吾妻，是當時台北最有名的一家旅館，圖為當年情景。

入，孫中山先生似從未離開艙房。船抵神戶，孫中山先生一行即轉車赴東京。」

村上玉田不失為有心人，他在中山先生一行抵日後，猶仍繼續採訪，從而填滿了我們這一段史實的空白。村上玉田說：中山先生抵東京後，係由頭山滿、犬養毅二氏招待。嗣後因來訪者甚多，恐中山先生不堪其擾，乃請移居箱根。不久中國局勢漸趨安定，中山先生即由日乘船，返回上海。

至此，中山先生在民國二年曾兩度旅日，已可獲得證實。原來中山先生一行是夏秋間由滬轉台抵日，住過一段時期，然後再回上海。到了十一月杪，才有第二次轉台赴日小住之行的。

在目今所可搜集之史料中，明白記述二年夏秋之間，中山先生曾在日本住過的，計有下列數端：

一、邵元沖著：「總理學記」載：

「民國二年夏，各省討袁軍既挫失。總理厲東京，多以餘力肆志典籍，日籍中有『漢文大系』者，略似今日流行之四部備要。凡四部要籍，若羣經、史、漢諸子、唐宋專籍略備，都三十餘大冊，貯於一架。總理日盡數卷，精研不懈，所學益進。凡所批答，悉簡明洞暢，無浸辭溢句。雖宿學者，亦以為弗如也。」

二、程天放著：「我心目中的國父」有云：

「民國二年春天，我再到南昌，繼續在洪都中學求學。那年暑假，國父因袁世凱叛國迹象已經顯露，就舉兵討伐。……不到兩個月，二次革命完全失敗。……國父也從上海到了台北

，再轉往日本，又回復亡命生活。（筆者按：孫中山先生討袁世凱發難於民國二年七月十二日李烈鈞湖口起義，程文所說：「不到兩個月」，與孫先生八月初離滬時間吻合。）

離台赴日生活枯窘

三、今總統府秘書長鄭彥棻教授著：「國父在海外」，其中有謂：

「民國二年，國父四十八歲。那年袁世凱叛國，國父不能在國內安居。幸因民國成立，日本不再禁止國父前去，以是國父便又去日本，策動推翻那背叛民國的袁世凱。」——可證孫先生二年第一次赴日尚受日本當局歡迎，第二次即因袁氏悍然通緝之故，入境相當的麻煩了。

四、其中當以葉夏聲著：「國父民初革命記略」記述甚詳，有云：

「民國二年之秋，國父以討袁各路軍事失利，本黨負責同志，如贛、寧、滬、皖、湘、粵各省文武，均以戰事結束，紛自上海租界買棹東渡。或遠走歐美，或近走南洋。國父順中外各方之敦勸，亦由滬過赴日本東京。既抵東，駐節東京赤坂頭山滿所屬婿家海老名少將之故邸。頭山滿者，時為古稀老人，鬚髮皓然，固一日本民黨浪人之首領，而侵華派黑龍會之會頭也。國父獨居一室，室為日制六疊（舊式之書齋。環堵蕭然，似學生下宿之旅舍。日中則出御一十六疊之客座，黯然黝黑無復光線。終日盤膝坐，屹然無倦容。日恆接見同志，籌劃黨務，密議軍事，仍圖再舉。生活至感枯窘。自奉極簡，不置僕從

，廚役一人，司炊爨而已。而膳食輒不過一盞，顧如此亦時惠不給。每月晦，輒遣其記室葉夏聲，為向日商和田瑞者，告貸四百日元，以償竟月之薪伙。往返奔馳，僕僕於道。雖尼父在陳，仲由負米，平原乞食，無過於此，而國父處之宴如也。公餘輒與左右親信同志，縱談生平所經革命諸役之軼事。」

當時，經常訪謁，供中山先生指揮派遣之老同志，計有陳其美、今總統蔣公及居正、田桐、戴傳賢、朱卓文、邵元冲、謝持、馬素、陳中孚、鄧鏗、夏重民、韓恢、范鴻仙、劉峴、高劍父、蕭壹、丁仁傑、覃振、凌鉞、夏述唐、蘇無涯、安健、蔡濟武、謝心準、劉德澤、陳家鼎、宋藹齡、葉夏聲、鄧蕙芳、傅文郁等三十餘人。

據葉夏聲謂：二次革命失敗後，除上列諸氏抵日繼續奮鬥外，尚有胡漢民、胡毅生、朱執信、李文範、陳融等諸氏「隱居郊坳，結廬讀書。」孔祥熙、馬伯援等從事宗教事業。此外則汪兆銘遠走巴黎，黃興、鈕永建到了美國，李烈鈞、張繼轉赴歐洲大陸。

另據馬超俊氏在他所著的：「國父廣州蒙難之經過」中說：

「陳逆（按指陳炯明）入中國國民黨還不算晚，同盟會成立時他便參加了。可是到第二次革命發動時，陳逆按兵不動，後經胡漢民先生和黨內同志的催促，他才不得已發表文告，宣布獨立，那張文告有兩張八行書箋這樣大小，油印的，看去簡直不成東西。我最初看見了心裏覺得很奇

怪。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陳逆對國父和國民黨的漠視。」

馬氏又說：

「第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國父改組其所領導的黨為中華革命黨，陳逆反對他的措施，帶了一批人到南洋開辦樹膠公司。從民三到民六這三年多間，他幾乎和國父斷絕了訊息。」

這一段史料，又證實了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初期，中山先生去過一趟澳門。召見陳炯明，促其宣布獨立，出兵援贛是極有可能的。

民國四十九年五月五日在台北病逝的總統府資政何成濬（前軍法總監、北平武漢行營主任）在他所著的「八十自述」中也說：

「討袁失敗後，總理與黃克強先生，暨同志中之鋒鏗較露者，都流亡日本，余亦與焉。」

更證實了中山先生是在二次革命討袁失敗後，馬上就到了日本的，時間應為八月初，而非十一月杪。

黃興離寧放洋日本

辛亥革命陽夏一役担任黃興參謀長的李書城，於其所著：「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一文中說：

「黃先生（指黃興——筆者註，下同）離寧所乘日本輪船未及滙停留，逕直開往日本。他曾在船上寫一密信告訴我說：他在吳淞口不能上岸，只得去日本。我還記得他信中有：『這次上了當』一句話（大意如此），不知意何所指？以後見面也未再詢問究竟，至今還不明白。（據沈著亦

雲回憶」載稱：「克強先生並不主戰，一日忽隻身赴南京起事。『隻身』係接洽第八師兩個旅長時之約。第八師師長陳之驥係馮國璋之婿，其旅長則與克強先生有舊，克強先生如約隻身而去，大勢不順，即被脅而歸。」——所謂上當，或即指此。——筆者註）李文又稱：「南京，上海討袁戰事失利後，我還未打算離滬。有一天，我在上海電車中看見上海護軍使的懸賞佈告，寫明緝拿黃興、陳其美各懸賞五萬元（黃為十萬。——筆者註），李書城，黃鄂各二萬元，且不論生死，一律給賞。我覺得不可再留在上海，遂同何成濬離滬赴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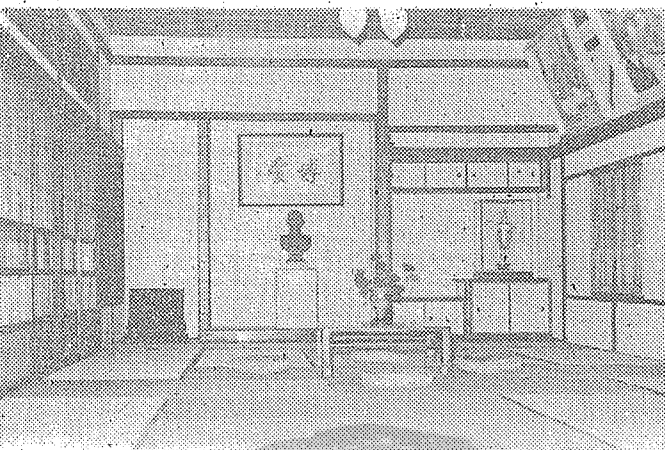
李、何二人抵達日本後，為時未幾，即與黃興移住東京，馬上就見到了中山先生，李書城記述這一段經過說：

「我們不久即同黃先生移住東京，國內參加討袁失敗的同志也陸續來到日本，大家交換意見，籌謀善後辦法。這時，孫先生提出了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的意見。他把本黨失敗的原因，歸咎於黨員不聽他的話，並且認為黃先生應負更大的責任。孫先生說：在南北議和時期，他憤袁氏狡詐，曾主張寧可開戰，不可讓步，但黃先生不贊成。以後他主張建都南京，要袁世凱南來就職，黃先生也不表示堅決支持。宋案發生後，他主張用武力解決，黃先生也不肯聽。他欲再赴日本求援，黃先生又力阻其行。最後他本擬親赴南京出師討袁，黃先生忽自告奮勇，阻其前往，致招挫敗，全局瓦解。」

李書城、何成濬既於七月三十一日見到懸賞

通緝告示後，立即離滬抵達日本。到後馬上去找黃興，相偕移住東京，跟中山先生見了面。計算時間，民國二年九十月間，中山先生就決不會在上海，自不可能在當年十一月杪，方始赴日。最可確定的一項證據，是民黨巨子劉揆一著：「黃興傳記」，此書於民國十八年正式問世。劉揆一在民國二年一段中肯定的說：

「公（按指黃興，下同。——筆者註。）在



光復後 中山先生住過的梅屋敷旅館，改成國父史蹟紀念館，中山先生所住房間的陳設仍保持原狀，供人瞻仰。

南京，聲援已絕，餉械不支。馮國璋，張勳又率大隊南下，且寧垣憲兵營與第三師之一團均有欲為變亂之謠。故第八師之前旅長陳裕時，以兵力單薄，又多不可恃，勸公即離南京。公意即使贛兵一營，亦願與敵死戰。陳謂公明知不可而為之，不過以一死塞責，究與國事無補，力勸公去，以圖將來。李書城、何成濬、石陶鈞、張孝準、耿觀文、楊源濬等以陳在第八師素有聲勢，轉生疑慮，勸公從之。公亦默察南方全局，一時不能有為，只得命陳之驥、章梓、劉建藩、王允恭、袁華選諸人力維寧垣秩序，而自往上海。經此一役，革命軍所植於國內之勢力，多被摧殘。九月初旬，孫總理與公俱赴日本，黨人亦紛紛相繼東渡。」（陳裕時迎黃興入京起義於前，又迫其離京於後，此可為黃興「上當」說作一注脚。筆者確定中山先生於八月初離滬，轉往台灣，小住一月有餘，再附輪赴日。到達日本的時間，正好是劉揆一所說的九月初旬。

關於癸丑二次革命失敗後，首要人物紛紛東渡，在民國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中華革命黨尚未正式成立以前，中山先生和國民黨人在日本的活動情形，以黃鄂夫人沈亦雲之「亦雲回憶」記載較詳，沈女士說：

「二次革命事先主張不同之兩派，到日本後更顯然異趣。一派主張革命再接再厲，責同志胆小而逃，謂將組織敢死隊以革命，並擬改組國民黨。另一派人在東京安排各地流亡出來的青年，曾辦有文、武兩個學校。文者名「政法學校」，武者名「浩然學社」。實際奔走其事者為殷鑽甫

先生。請得彼邦同情我國革命之學者來盡義務。我只聽到名法學者寺尾亨博士在政法學校授過課。」

又，黃鄂當時曾有一長函致陳其美，為其致陳之最後一信，其中有一段，也證明了當時二次革命首要留在上海的不可能，是為：

「袁世凱正多方宣傳國民黨為『亂黨』，吾人不要真為亂黨，勿上無根抵失意無聊者之當。以袁氏此時防範之密，爪牙之衆。被派回國做局部破壞工作，其人如有心而真做事，勢被犧牲。若屬不堅定份子，則一離本營，鞭長莫及。前者驅有用之人，為無益之犧牲。後者將難得之財，供取巧者浪費。」

當年情勢，確乎如此。在那麼險惡的環境之中，中山先生怎可能獨自留在上海，與袁世凱的惡勢力，週旋達三閱月之久呢？

第三次來台小留半天

至於中山先生的第三次蒞台，則係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十一月杪，據當年中山先生的居停主，梅屋敷主人之一的藤井悟一郎謂：「第二次（實則為第三次——筆者註）。似乎是民國二年十一月末，或者十二月初的時候。因為那時（中山）先生係穿黑色西裝。同來的僅先生護衛兼招待員村田省藏一人。雖然不能確知先生由何處來台，但一般推測，大概是從福建渡海登陸淡水。那時台北、淡水之間還沒有汽車行駕，想係乘坐火車抵台北，即由村田引導先生至梅屋敷。……」

梅屋敷，即今中山北路一段，復興橋塊的國父史蹟紀念館。日據時代，地名是御成町。梅屋敷落成於民前十二年庚子（一九〇〇），係日本人開設的一家酒店，創業者是大和宗吉、藤井悟一郎兩兄弟的父親。此翁自新竹山間移來梅樹二百株，遍植園中，因而以「梅屋敷」為其所業之名。

據民國三十九年十月十日台灣新生報載李青記述的：「國父在台北的起居注」一文中稱：「國父第二次（應為第三次——筆者註）來到台灣，是在民國二年十月，聞他與廣東總督（當指廣東都督胡漢民——筆者註），自香港乘英輪來台。輪抵基隆時，台灣總督派警署總長和警部二人，前往迎接並加招待。即乘小汽車同赴新北投公共浴場（附圖四——原註，確有圖，下同），為國父洗塵。國父飯後，並且在那裏洗了一次澡。據當時在公共浴場的廚頭陳廣才（附圖五）說：國父身穿學生裝全套，足穿黑皮鞋，和一個身體肥胖，高達五尺餘的人（聞係廣東總督——原註），及日人警署總長和警部等四人，于上午十時同到公共浴場，在特別室（附圖三）休息。十一時在特別室（附圖二）洗澡，十二時在會客室午餐，吃日本定食，是他（按指陳廣才——筆者註）親手所煮。一份二元，四菜一湯。計有生魚片、燒魚、甘煮雞肉、青菜各一盤及蛤湯一碗。飯後午睡片刻，直至三時始行離去。此間特別室，日本皇太子亦曾住過一個時間。在日治時代，多為招待上賓之用。台灣光復，改為台北縣議會招待所。」

以上所錄的這一段文字，堪謂中山先生在台起居注中，最詳盡的一段。不但有人證（為中山治餐的廚頭陳廣才當時猶仍健存，而且還有物證（附圖經過考證，全部屬實）。不過，追憶為時過久（本文由李氏寫成於事後三十七年），其中有一點顯然頗有錯誤，又有一點必須加以註釋。茲分別臚列於下：

一、「聞他與廣東總督」顯然非是，因為陪侍過中山先生蒞台之廣東都督僅祇胡漢民一人，而如所週知，胡氏容貌清瘦，不似其下所謂：「身體肥胖，高達五尺餘的人」之形容。依此形容度之，實應為上文梅屋敷主人之一，藤井悟一郎所指的中山先生唯一護衛兼招待員村田省藏。村田係日本外交官，時任領事，太平洋戰爭期間曾任日本駐菲律賓大使，戰後被盟軍總部列為戰犯。

二、民國二年係日本大正二年（一九一二年），所以李氏所謂的日本皇太子，即今之裕仁天皇。此外，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到三十日的上海時事新報上，載有陳以益的「國父在台灣的」一文，記述中山先生是次蒞台之行有謂：「……同行者有日本領事館館員村田伴同到台，某日上午在淡水登岸，改乘火車，十一時抵台北，即至御成町梅屋敷旅館休息。」

「國父此次過台逗留，為時甚暫。或云小住數日，或云僅數小時，現已無從詳考。御成町今改為中山北路，梅屋敷則為新生活賓館。當時國父駐蹕之室，現已劃為國父史蹟紀念館，一切保留原有形態。」

梅屋敷主人的報告

根據梅屋敷主人之一，當年曾親接中山先生警款之藤井悟一郎說：中山先生係由村田省藏陪同蒞臨梅屋敷。中山抵步後，梅屋敷大門口便有三名日警站崗守衛。由於梅屋敷是一月酒店，乃由主事者指定兩名侍者負責接待貴賓。男侍者日名岡村吉江，本名五郎，當年十六歲。女侍日名村上百惠，本名靜子，當年才十四歲。在這一男一女兩個小侍者的熱烈款待之下。中山先生的那一席，除村田省藏外還有一兩位陪客。姓甚名誰何國之人如今已無法查考了。那一席餐後酒，由於中山先生的威儀與持重，顯得有點沉悶。因為中山先生但祇溫謦的微笑，他對於佳餚美酒並無興趣，食量既少，更不輕易舉杯，而且相當的沉默寡言。虛應一番故事過後，「梅屋敷」的小老闆大和宗吉靈機一動，命人取來文房四寶，親自跪地為中山先生磨墨，恭請即席揮毫。中山先生以情不可却，乃為大和宗吉題了「博愛」二字，筆飽墨酣，大氣磅礴。然後再署名孫文。這時候，中山偶一回頭，看見大和宗吉的弟弟藤井悟一郎正好站在他的身旁，目不轉睛的注視這位亞洲第一偉人，中國革命之父。中山先生莞爾的笑了，伸手撫摩藤井悟一郎一頭的短髮，勉勵他道：

「要勉學，成人！」

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後，藤井悟一郎曾以他珍藏達三十三年之久的一幅中山墨寶：「大同」，獻贈台灣省黨部，並且報告這一段經過說：「當時雖知孫文先生係中國偉人，實不知他

就是我們久已聞名過的中國革命領袖孫逸仙先生。如果當時讓我們知道他的話，一定更注意記錄他的舉止言詞，不致如今日之模糊，誠覺遺憾。……先生回頭看見我（按指藤井——筆者註）站在他的旁邊，即以手撫弄我的頭髮，說了幾句話，並繼續書一幅墨寶賜我。當時不解先生的語意，更忘却是用中國語，抑且是英語？後來旁邊有人翻譯了告訴我，先生說的是：『要勉學成人』，使我非常感激。那時先生所寫的只有兩幅。一書『博愛』，係書與胞兄大和君，另一書『大同』是給我的。二幅皆署名『孫文』。是日天氣晴朗，先生寫完後移步庭園，以其所書之二幅墨寶，令靜子、五郎二人各執一端，先生對之作笑容。先生次又閑步園中的小假山，均攝入鏡頭。担任攝影者是台灣當時唯一的電影業者高松豐吉，及其所率來的技師。此舉或出於台灣的總督府的意思，因為民間根本無人能知先生之抵台。高松豐吉已亡故，此影片之浮沉去處，更無知者，最所痛惜，我兄弟前此每想搜出這影片，奉獻中華民國當局永垂紀念。無奈事與願違，徒增怛怛耳！

「攝影完後，先生為搭船赴日，即動身到基隆去。當時台灣——日本間的定期輪船，皆於下午四點由基隆出航。先生不知係乘大阪商船，抑日本郵船東渡，但可能在門司或神戶登陸。聞先生此行係到東京訪問犬養毅及頭山滿氏，並以東京為中心機關，重組中華革命黨，準備加緊討袁等任務。」

「此後，村田省藏氏每次抵台，如逢村上百

惠，必傾談當時事實，並讚仰先生之偉大。想再看見當時所攝的影片，均無所得，引為悵惘。曾幾何時，而村田氏今竟陷為戰爭罪犯，未免人世滄桑太甚！村田其猶記先生的『博愛』、『大同』乎？」

「先生在梅屋敷所書墨寶兩幅中之『大同』，目下我還珍藏着。『博愛』一幅則因當時梅屋敷是酒店，過客頗多，屢求購買。無論賣給誰，都不公平而且不應該，且亦無出賣之意，又恐宵小竊盜，故不得不將其攜至東京。現在唯有商請台灣省黨部派人前往東京取回，使能同列一處，必將更增光彩。及今思之，能在三十多年世界動亂變遷中確保此二幅墨寶，內心甚感欣慰。今台灣選中國，我不敢自己專有，謹特奉獻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請設館保存，永垂紀念。」

藤井悟一郎畢生崇仰中山先生，因此，除了「同仁」、「博愛」兩幅墨寶以外，他並且將梅屋敷整座建築移贈我國政府，這便是屹立至今的中山北路一段復興橋下的國父史蹟紀念館了。

對台胞的無比關懷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中山先生第三次來台，僅祇在北投沐浴，進午餐。然後到梅屋敷，進用一點餐後酒，攝影留念後，旋即匆匆離去，前後不過幾個小時。中山先生這一次從台灣到日本，由於袁世凱已經悍然下令通緝，過程是相當的驚險曲折。據陳固亭著：「國父與頭山滿及宮崎兄弟」一文載稱：

「國父於一八九七年六月離英，經歷美洲加

拿大，七月五日離加赴日時，由於犬養毅的介紹，才結識在野志士頭山滿等多人。他們一見如舊，抵掌談興亞大計，至為快慰。辛亥革命後，頭山、犬養等曾至上海歡迎國父。民國二年（一九一三）秋，討袁二次革命失敗，國父再赴日本。當時日本首相是山本權兵衛，外相牧野伸顯，他們對北京政府不敢得罪，乃下令拒絕國父入境，神戶憲警奉命制止國父登陸。犬養得訊，非常憤慨，即與古島一雄面商，決勸告當局改變態度。此時頭山怒容滿面，匆促入室，見犬養即高聲曰：『余寬死所不得，今始得之！』犬養詢以何故遽作此言？頭山答以：『余正欲前往神戶，與警察作殊死戰！』犬養婉勸不可妄動，且謂：即令玄洋社正氣動人，然人數究不及警察之多。縱令戰勝，孫先生能否上陸，亦未可知，一切聽余辦理，不可操之太急。』頭山滿對國父的敬仰和義俠風度，於此可見。

「當時古島一雄奉犬養之命，前往神戶迎接國父。頭山在旁，對古島言：『必須捨命為之，後事余可全部負責。』頭山之意，蓋欲古島萬一失敗，應與國父相抱投海，以示日人氣節。犬養告古島：『應慎重行事，千萬勿操之太急。余決訪當局，自信必可說服。』古島抵達神戶，果接犬養急電，文云：『山本業已諒解，希轉告孫文。』當時古島與菅野上船，祕密迎接國父先住神戶松方別墅，後潛往東京，暫住頭山廬邸。」

這一段記述，相當生動，與藤井悟一郎在台灣省黨部所報告的：「聞先生此行係到東京訪問犬養毅及頭山滿氏」，完全符合。

中山先生第四次來台，係在民國七年六月初，辭卸軍政府大元帥職以後。早在七年元月二十一日，中山先生即派朱執信赴日，持中山函分訪頭山滿、宮崎寅藏、犬塚木、寺尾、萱野長知、菊池寬等日本友人。希望他們影響日本政府，贊助護法之舉，勿再援助段祺瑞。三月十日，頭山滿及犬養毅俱致函中山，請他赴日一行。於是中山再派朱執信東渡，面告犬養、頭山等不克東遊的原因，同時向日本朝野闡明護法救國的目的。五月四日中山先生辭大元帥職，六月一日即偕秘書戴傳賢自汕頭啓程，取道台北東渡日本。據日人井出季和太回憶說：

「當時日本當局一方面爲了對北京政府的國際禮貌，一方面爲了本島（按指台灣——筆者註）的治安關係，對孫中山先生，非常注意。日本官吏曾在孫先生的船抵港時，派人到船上謁見。孫先生爲要速往神戶，適有便船於前一日抵基隆，即搭乘該船而去。」

如以這一段日本人的回憶爲準，則中山先生第四次來台根本就沒有上岸，便被日據官方有禮貌的擋駕，立刻換船他去。事實上則井出季和太與黃季陸先生一樣；「有所漏記。民國十六年四月一日，廣州出版的『台灣先鋒』中，所刊載戴傳賢在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演講：「孫中山與台灣」裏面相當重要的一段，戴傳賢說：

「總理一到台灣，台灣官憲即派員到船中，招待總理一行直驅到台北，翌晨便開船回神戶去。」戴氏尤曾感慨萬千的說：

「日本人有板垣懇助其人者，在民國四五年之間，曾組織同化會。於我們的民族觀點上，是不能滿足的。但其主張溫和，目的在伸張民權。他發表宣言，非難（日本）政府慘殺台灣人太

多，且蹂躪壓迫無所不至，主張非使台灣人獲得一點自由不可。日本政府對板垣這種微溫的主張，尚且不能容許，那裏肯給台灣人與中國國民黨的革命領袖聚談的機會？其政策是意圖使台灣同胞永久不受革命思想的刺激，而永爲日本帝國主義下的愚民。」

中山先生第四次滯台，只在台北住了一夜，翌晨即啓程赴日。而這一次到日本，也是爲期最短暫的。由於中山先生在日時深感外交方面頗難活動，一切計劃都未能實行。加以罹染日疾尙待診治，乃匆匆折返上海，時在六月二十五日。台日之行，連途中行程算在一起，也祇二十五天。

中華民國孫逸仙救

至於中山先生第五次來台，亦即他一生中的最後一次台灣行。時在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山先生應邀北上會商國是。先從廣州到上海，小住三日後，二十一日凌晨六時三刻自莫利愛路本宅出發，到虹口滙山碼頭乘日輪上海丸啓程，同行者有孫夫人、李烈鈞、戴傳賢、石青陽、謝持、居正、孔祥熙、陳友仁暨黃昌毅夫婦。船抵基隆海面，曾作短暫停泊，並未靠岸，因而也就無法登陸一行。後即駛往神戶，略作勾留，再航天津。

中山先生抵天津後，以張園爲行館。臨時執政段祺瑞曾派代表葉恭綽、許世英到津請謁，備致竭誠歡迎，請速入京之意。當時中山先生已感不適，葉、許二氏乃於病榻前報告北京政局近況，中山先生認爲段政府對各國公使有：「外崇國信」之保證，實係變相表示仍將尊重列強加諸於我之平等條約，因而極感不快。他曾面詰葉、許二氏說：「外交團要求尊重條約，聞執政政府已照會覆允，信否？」

葉、許二氏答稱確有此事，不過照會尙未送出。中山先生聆言勃然大怒，厲聲說道：

「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麼道理呢？你們要陞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爲何還來歡迎我呢？」

葉、許二人爲之悚然，狼狽告退。但是中山先生肝病却自此爆發，腫痛交至，脈搏驟增至每分鐘一百二十次以上。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山先生入京，病勢漸漸轉劇。他在垂危之時猶仍念念不忘處於日人蹂躪壓迫之下的台灣同胞，他曾叮囑戴傳賢下列三問題，中山先生說：

「我對日本問題有三個最少限度的主張。一是日本須放棄日本與中國所締結一切不平等條約。二是須供台灣、朝鮮兩民族，實施最少限度的自治。三是日本對蘇聯、應該不反對其政策，並不阻止蘇聯與台灣及朝鮮的接觸。」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病逝北平。十二天後，噩耗傳到台灣，全台震悼。乃於三月二十四日晚間，在日人高壓、監視之下，舉行空前未有的一次悲愴追悼大會。

辛亥前後，因受中山先生的感召，而從事排日革命，前仆後繼慷慨捐軀的台灣革命烈士，計有劉乾、林啓楨、黃老銜、羅福星、陳阿榮、張火爐等多人。其中羅福星氏可謂事功最巨，影響最廣，且與辛亥革命關係最密之一位。在他的遺詩之中曾有一首七律：

中土如斯更富強，華封共祝著邊疆，民情四海皆兄弟，國本包桑氣運昌。孫真國手著光唐，逸樂豐神久既章，仙客早貶靈妙藥，救人於病身相當！

此詩中每一句的第一個字，連貫起來，便是：「中華民國，孫逸仙救！」